

我国教育投资比例的历史分析

王善迈

一、研究教育投资比例的指标

为了对我国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进行正确的分析,首先必须对教育投资、国民经济及二者关系的概念、指标及计算范围做出科学地规定。

教育投资是投入到教育领域中、用于培养不同熟练程度的后备劳动力和专门人才,以及提高现有劳动力智力的人力物力的货币表现。从投资对象来说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传统的学校教育投资,即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投资,用以培养后备劳动力和专门人才;二是学校教育以外的一切成人教育或继续教育的投资,用以提高现有劳动力和专门人才的智力水平。前者是教育投资的主要部分,后者是教育投资的次要部分,但后者的绝对量及其在教育总投资中的比重有不断增长的趋势。这是当代科技迅速发展,知识和技能更新的周期缩短,从而需要对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不断进行再教育和再训练所决定的。从投资来源说,则包括国家财政、国营和集体事业单位、家庭和个人用于教育的一切支出。其中国家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是主要部分。本文考察的对象,只限于国家财政用于学校教育的投资,包括教育事业费和教育基本建设投资。

在我国,反映国民经济状况的基本指标主要有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财政收支、基本建设总投资。

教育投资最终来源于国民收入,国民收入总量和增长速度,是反映一国一定时期国民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的基本指标,而人均国民收入量和增长速度排除了人口因素,是反映一国一定时期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富裕程度的基本指标,也是决定教育投资比例的基本指标。

社会总产值也是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它在反映国民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教育投资同国民经济关系的动态中有一定的意义。但由于社会总产值中有一部分是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价值的转移,不能用于教育投资。因此,在反映教育投资同国民经济关系上受到一定限制。

财政收支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指标,财政支出中的教育投资是教育总投资中的主要部分,本文考察的教育投资只限于这一部分。因此,教育投资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可以作为反映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比例的重要指标,但因为财政资金是国民收入分配再分配中的一部分,是派生收入,而且财政收支及其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受财政体制及其变动的影 响,在不同时期难以比较。因此,教育投资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不能确切反映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使用这一指标时,教育投资应限于财政支出中的教育支出,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比较时,应排除财政体制及其变动的影 响。

教育事业费是教育投资的主要部分,大体上可以反映教育发展规模,我国同外国一般较稳定,因此,教育事业费在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和财政支出中的比重,可以反映教育投资

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

基本建设投资是用于固定资产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它为技术进步条件下扩大再生产提供劳动手段,为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供物质条件,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教育基本建设投资,是基本建设总投资中非生产性基本建设投资的一部分,它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物质技术条件。在技术不断进步、经济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如果基本建设投资分配比例不变,教育基本建设和全部基本建设投资至少应同步增长。否则,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物质技术条件的改善,就会因此受到限制,适应不了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对教育的要求。因此,这一指标,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教育投资同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

由上可知,反映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比例的基本指标是教育投资在国民收入和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其它指标也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教育投资同国民经济的关系。

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当代,教育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越来越大的作用,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教育是基础,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必须增加教育投资。但是,一国一定时期,教育投资的多少,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占多大比例,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愿望决定的,最终是由社会经济水平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决定着教育投资的需要量,也决定着教育投资的可能量。因此,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期,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是不同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拿我国的教育投资比例同外国进行简单对比,并由此对我国教育投资比例进行评价和得出某种结论。

为了合理确定我国今后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教育投资在国民收入和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在这里,科学地分析我国教育投资比例的历史情况,总结安排教育投资的历史经验,无疑是十分必要的。本文的目的正是在于,通过对我国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比例的历史分析,探讨教育投资同国民经济关系发展的趋势和主要问题,为今后合理安排教育投资比例提供参考依据。

本文所用国民经济和教育投资指标的数据,均采用当年价格,未扣除物价变动因素,基本建设投资用的是拨款数。统计原始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成就》。

二、我国教育事业和教育投资的历史概况

解放前,我国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在人口总量中,80%是文盲,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仅占全国人口的5.6%,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左右。1947年大专学校仅207所,在校生155 036人。1946年中等学校只有5892所,在校生1,878,523人,小学校只有28.9万所,在校生23,683,492人。学校教育地区分布和中高等专业结构极不合理,带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烙印。

解放后,我国教育事业获得了迅速发展。1983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183,888万人,比1949年增长7.1倍。其中:普通高等学校120.7万人,增长10.3倍;中等学校4634万人,增长36.9倍;小学13,578万人,增长5.6倍。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4%,12岁及12岁以上人口中的文盲率下降到30%左右。1949—1983年,普通高等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各类专门人才411万人,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培养了722万人,各种职业学校和普通中学培养了大批劳动后备力量,普通高中共有毕业生6285万人,普通初中共有毕业生1.858万人,农业、职业中学共有毕业生110万人,平均每万人口中,大学生由1949年的2.2人,上升到1983年的11.8人,中学生由23人上升到452人,小学生由450人上升到1325人。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大大提高了劳

动者的文化教育程度,有力地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使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愚昧无知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见表1—3)。

为保证教育事业的发展,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1953—1983年,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投资累计为1524.5亿元,其中:教育事业费1328.4亿元,教育基本建设投资为196.08亿元。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投资年平均增长9%,教育事业费年平均增长9.3%,教育基本建设投资年平均增长7.1%。同期,国家财政预算内教育投资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平均为1.18%,占国民收入比重平均为2.52%,占财政支出比重平均为7.61%,教育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同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平均比重为2.21%,巨大的教育投资保证了我国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

表1 建国以来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数

单位:万人

	高等教育		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	普通	小学
	研究生	本科生	计	中等技术学校	中等师范学校	高中	初中	
总 计	4.1	411.0	722.4	395.1	327.3	6285.0	18858.0	38648.0
1949—1957	0.87	35.9	111.4	50.6	60.8	78.2	460.4	2260.5
1958—1966	0.77	133.6	196.4	117.4	79.0	304.4	1377.2	5639.7
1967—1977	0.45	108.7	189.7	103.5	86.2	2845.4	9558.5	18193.4
1978—1983	2.08	132.8	224.9	123.6	101.3	3057.2	7461.9	12554.4
建国35年为 建国前累计 培养的倍数		19.5	13.2	21.8	9.0			

表2 建国以来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数

单位:万人

	高等教育			中等专业学校		农、职 业中学	普通 高中	普通 初中	小学
	研究生	本科	专科	中技	中师				
1949	0.06	9.4	2.3	7.7	15.2	—	20.7	83.2	2439.1
1953	0.42	15.2	6.1	29.9	36.9	—	36.0	257.3	5166.4
1957	0.32	39.3	4.8	48.2	29.6	—	90.4	537.7	6428.3
1962	0.61	26.6	6.4	35.2	18.2	26.7	133.9	618.9	6923.9
1966	0.34	50.9	2.4	33.6	13.4	—	137.3	1112.5	10341.7
1978	1.09	45.9	38.0	52.9	36.0	—	1553.1	4995.2	14624.0
1980	2.16	86.2	28.2	26.1	48.2	45.4	969.8	4538.3	13578.0
1983	3.72	92.9	27.8	68.8	45.5	122.0	629.0	3768.8	13578.0
1983年 为1949 年的倍数	62	10	12	9	3		30	45	5.6

表3 平均每万人口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数

单位:万人

	1946	1949	1957	1965	1978	1983 ^②
普通高校	3.4	2.2	6.8	9.3	8.9	11.8
成人高校	—	—	1.2	5.7	①	11.0
中等学校	40.7	23.4	109.2	197.4	689.5	452.2
中等专业学校	8.3	4.2	12.0	7.6	9.2	11.2
普通中学	32.4	19.2	97.2	128.7	680.3	429.1
高 中	6.9	3.8	14.0	18.0	161.4	61.4
初 中	25.5	15.4	83.2	110.7	518.9	367.7
农、职业中学	—	—	—	61.1	—	11.9
小 学	513.7	450.3	994.3	1602.0	1519.2	1324.8

①由于一度有很大虚假现象,未将数字列入。

②根据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计算。

三、我国教育投资与国民经济关系变动的趋势

分析三十年来我国教育投资与国民经济增长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可以看出如下的基本趋势:

1、教育投资的绝对量及其在国民经济主要指标中的比例,随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增长。

三十年来,国民经济是不断发展的,随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力的不断增强,教育投资不断增长,个别时期国民经济成负增长,随国力的削弱,教育投资也呈负增长。不仅教育投资的绝对量随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增长,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重要指标中的比例,也同样随国民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提高。(见表4—5)

学校教育是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各种熟练程度不同的后备劳动力和各种专门人才的。从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教育的需求来说,随着人口和适龄教育人口的增加,随着技术不断进步条件下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对教育所培养的后备劳动力和专门人才所需数量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高,即使受教育者人均教育投资数量不变,也要求教育投资随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增长。从经济发展为教育投资增长提供的可能来说,教育投资最终来自国民收入,政府支出的教育投资直接来自财政收入,随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多,国家财力的增强,为教育事业可能提供的人力、物力、财力也日益增多,在国民收入和财政支出分配比例不变的条件下,教育投资的绝对量和相对量也有可能不断增长。

我国三十年来,大多数时期教育投资随国民经济发展而增长的历史事实,从正面证明了上述结论,在个别时期教育投资随国民经济的负增长而递减,也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结论。教育投资的绝对量和相对量的变动,最终必然受经济发展所制约,这是教育投资同国民经济关系变动的一般规律。

2、教育投资与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相比,以超前的速度增长。

1953—1983年,我国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财政支出、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8%、6.2%、6.6%、8.8%。同期,教育投资和教育基本建设投资的年平均增

长率分别为9%和7.1%。

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除1963—1965年的调整时期和“三五时期”以外,教育投资也是快于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的增长速度(见表6)。

教育投资同物质生产领域中其它部门的投资相比,具有投资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占用和消耗较多的社会劳动,却不能提供劳动成果。当它的劳动成果投入到物质生产部门以后,也要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收回其投资。教育投资的这一特点,是由教育周期较长这一特点决定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一个普通的劳动力至少需要十年以上,而培养一个高级专门人才则需要十五年以上。教育和教育投资的这一特点,决定了教育投资必须先行,教育投资必须比国民经济以超前的速度增长,只有这样,教育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它的需要。

教育投资的超前增长,反映了科学技术进步条件下,教育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越来越大的作用的一般规律。在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条件下,经济的发展不再是靠生产资料和劳动者数量的增加,而主要依靠生产资料和劳动者质量的提高,主要依靠科技及其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科学技术是强大的生产力,而教育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基础。科学技术的生才(科技的研究)和再生产(科技成果的掌握)都有赖于教育的发展,有赖于教育的普及和提高。要使经济更快的发展,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必须使教育投资以比经济更快的速度增长。

我国三十年来,经济的发展正是在技术进步条件下进行的。我国已逐步完成了农业国产工业国的转变,工业生产中逐步完成了手工生产向机械化生产的转变,最新的科技成果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在这一技术、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者和专门人向的素质日益重要,教育的作用日益提高,从而促使教育投资的超前增长。

3、受教育者的人均教育投资逐步上升。

三十年来,我国各级各类受教育者年人均教育投资总的说来是逐步上升的。例如,每一在校大学生年均教育事业费从1952年的730多元上升到1982年的2000多元。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受教育者的人均教育投资的不断提高,这是教育经济学中的一般规律。教育投资从其使用的对象来说,由教育事业费(经常费)和教育基本建设投资两部分构成,教育事业费中,其主要部分又是教师的劳动报酬。随着一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逐步改善,他们的劳动报酬逐步提高。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经济的不断发展,要求教育的物质技术条件不断改善,要求教育的内容、组织形式和教育方法和手段不断更新,即使扣除物价上升的因素,各级各类受教育者的人均教育投资必然是不断上升的。

表4 各时期国民经济和教育投资的增长

单位:亿元

	一五时期	二五时期	1963—1965年	三五时期	四五时期	五五时期	1979—1983年
社会总产值	7247	11143	6919	15468	23613	34420	46132
国民收入	4035	5480	3553	8031	11382	15119	19898
财政支出	1345.6	2288.7	1204.9	2518.9	3919.6	5246.5	599.75
基建总投资	558.47	1206.09	421.89	976.03	1763.95	2342.17	2674.81
教育投资	95.59	142.95	88.76	157.46	224.5	392.32	629.95

表 5 各时期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

单位: %

	一五时期	二五时期	1963—1965年	三五时期	四五时期	五五时期	1979—1983年
占社会总产值	1.31	1.28	1.28	1.02	0.95	1.14	1.37
占国民收入	2.33	2.61	2.50	1.96	1.97	2.60	3.17
占财政支出	7.03	6.25	7.37	6.25	6.73	7.48	10.51

表 6 各时期国民经济和教育投资的平均增长率

单位: %

	一五时期	二五时期	1963—1965年	三五时期	四五时期	五五时期	1979—1983年
社会总产值	9.61	2.31	14.40	7.11	7.20	9.57	10.05
国民收入	9.04	0.35	14.42	6.79	5.38	8.06	9.20
财政支出	11.57	0.07	15.16	6.85	4.80	8.12	3.07
基建总投资	26.89	-13.04	36.09	11.72	5.54	6.43	3.47
教育事业费	16.85	4.28	6.55	-1.10	11.86	14.31	14.28
教育基建投资	16.59	-30.73	57.55			40.22	32.04

三十多年来,尤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党和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提高他们的劳动报酬水平。与此同时,党和政府不断投入大量资金,努力改善办学的物质技术条件。三十多年来,国家财政预算内拨付的教育基本建设投资累计达196.08亿元,使我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物质技术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而使我国各级各类受教育者年人均教育投资得到了逐步提高。

四、我国教育投资同国民经济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育投资在不同时期波动较大。虽然总的说来,我国教育投资的增长速度略快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主要指标中的比重是上升的。但从各时期来看,波动是比较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1983年,教育投资同国民经济的发展比较协调。1958—1978年的二十年间,教育投资的绝对量和相对量起伏较大,教育事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严重失调。

“一五”时期,中央明确提出,教育工作必须密切配合经济建设,以培养大量建设人才和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为中心任务,教育事业和教育投资正式纳入国民经济计划。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比较协调,教育与国民经济关系也比较协调。“一五”时期,教育投资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为1.31%,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2.33%,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7.03%。其中,国家财政预算内的教育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5.7%。教育基本建设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为3.05%。国民经济发展比较快,教育事业也得到迅速发展。1957年与1952年相比,高校在校生增长了1.3倍,中专在校生增长了22.3%,中学在校生增长了1.5倍,小学在校生增长了25.7%。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和国务院十分重视智力开发,加速培养各种专门人才。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教育投资增长较快,逐步理顺了教育同国民经济的关系。1979—1983年

教育投资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为1.37%，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3.17%，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0.51%。其中，国家财政预算内的教育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8.63%，教育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为4.22%。可以说，这一时期教育投资同国民经济的关系，是解放以后最好的时期。

但是，也应当看到，近几年教育投资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仍不能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一是过去二十年，特别是“文革”期间欠账大，增加的投资具有“还账”的性质；二是增加的教育投资有相当一部分用于政策性开支。这种情况在中小学更为突出。据调查有的地区属于政策性措施和制度变动等增加的开支，占增加普教经费的85%；三是人员超编过多，增加了“人头费”开支；四是教学用品涨价，等等。这些问题有的要国家给予照顾，有的则要通过教育改革来加以解决。

以上情况说明，我国将教育事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有计划地进行教育建设以来的三十年间，前五年和后五年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比较协调；中间从第二个五年计划起的二十年间，教育投资一再被挤，是教育事业同国民经济关系失调的时期。这一时期，既有教育投资不足影响教育事业发展问题，也有教育事业超出国力可能，盲目大发展，国家对教育的投资不可能大量增加，造成教育事业大起大落，影响教育事业正常发展问题，特别是“文革”时期，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教育投资更不成比例，这是造成我国教育事业比较落后的重要原因。

2、教育投资与教育事业的发展不相适应。教育事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投资是保证教育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在教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适度的条件下（即在教育事业的发展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和可能的条件下），教育投资同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否相适应，是衡量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比例是否合理的直接和主要的标志。如果教育投资过少，既定的教育事业规模和速度目标就不能实现，或事业规模缩小，速度放慢，或事业规模和速度不变，教育质量下降；如果教育投资过多，则造成教育投资的经济效果下降，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从我国的历史实践来看，较多的时期存在教育投资过少，与教育事业发展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严重不平衡。比较突出的是1958年以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教育同国民经济一样盲目大发展。1960年与1958年相比，高等学校在校生增长45.8%，中专在校生增长50.8%，中学在校生增长20.4%，小学生在校生增长8.6%。而教育投资不但没有相应增加，反而减少。1958年比1957年下降6%，其中：教育事业费下降2.3%，教育基本建设投资下降26.2%，而同期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财政收入、基本建设总投资确增长了33.1%、23.1%、34.6%和87.7%。1961年比1960年，教育投资下降24%，1962年比1961年又下降15.5%。其结果导致教育事业全面萎缩，教育质量下降。1962年同1960年相比，高等学校在校生减少13.2万人，中专在校生减少168.1万人，中学在校生减少273.2万人，农职业中学在校生减少203.5万人，小学在校生减少2455.2万人。

3、受教育者人均教育投资下降和不稳定。各级各类学校受教育者人均教育投资，是衡量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比例合理与否的另一重要标志。它从一个方面反映着教育的质量。合理的教育投资比例，至少使受教育者人均教育投资不低于前一个时期已达到的水平。如果低于前一个时期，在既定的教育规模和增长速度不变的条件下，就会因教育必要的物质条件

得不到保证,使教育质量下降。要保证教育质量,就必须调整教育事业的发展计划。这两种情况都会因教育培养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质量不高,或数量不足,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而表明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是不适当的。

建国以来我国的受教育者人均教育投资是起伏不定的,尤其在1958—1978年的20年中更是不稳定,甚至有大幅度的下降。造成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第一,是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超出了国力的可能,只考虑需要,不考虑可能;第二,是由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对教育事业重视不够,对教育与经济建设的比例关系综合平衡不够好;第三,是教育事业的发展在一个时期内,只追求数量,忽视质量,只注意数量的增长,而不注意教育物质条件的改善。

4、教育所培养的劳动力,尤其专门人才在数量、质量、结构上远远适应不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合理与否,最终表现在教育所培养的不同熟练程度的劳动力和各级各类专门人才,在数量上、质量上、结构上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否相适应。教育投资合理比例的最低界限,是教育投资要能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劳动力是专门人才的最低需要量,如果教育投资在此界限以下,经济和社会发展将因合格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不足而受到限制。

教育所培养的劳动力和专门人才同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否相适应,要以经济和社会以及教育的科学预测和长远规划目标为依据。在这方面,我国长期以来没有或没有完整的预测和规划,即使有些规划目标,也往往因缺乏科学依据朝令夕改。因此,我们难以对过去的教育投资比例合理与否做出准确的数与质的评价。但是,客观事实是我国劳动者文化教育素质太低,各种专门人才数量严重不足,质量不高,结构不尽合理。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所指出的:我国“基础教育薄弱,学校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合格的师资和必要的设备严重缺乏。经济建设大量急需的职业和技术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高等教育内部的科类、层次比例失调。”从而严重地影响着我国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进程。这充分说明我国过去教育投资比例过低,适应不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状况必须逐步加以改善。

历史经验证明,教育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合理比例,必须使教育投资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使教育所培养的不同熟练程度的劳动力和各级各类专门人才,在数量上、质量上、结构上,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低限度需要。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全党工作重点一直没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由于“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的影响,教育事业和教育投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要地位,而且受到“左”的政治运动的频繁冲击。“文化大革命”更使这种“左”的错误走到否定知识、取消教育的极端,从而使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广大教育工作者遭到严重摧残,耽误了整整一代青少年成长,而且使我国教育事业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在许多方面本来已经缩小的差距又拉大起来。

五、我国教育投资的对策

我国正面临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在新的技术革命的条件下,人的知识、才能,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教育正是开发智力资源的一个重要部门,教育投资是经济效益最大的一种投资。发展教育事业必须大力增加教育投资,但是也必须看到,教育投资

的增加必然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教育与经济之间客观存在的相互关系,合理安排教育投资,促使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1、教育投资必须继续以高于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和财政支出的速度增长。教育投资以比国民经济主要指标超前的速度增长,不仅是我国三十年教育投资增长的趋势,而且也是各国教育投资增长的一般趋势,只有保证教育投资的超前增长,才能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才能推动国民经济更快地发展,加快我国实现四化的步伐。

三十年来,虽然总的说来,我国教育投资,是以比国民经济超前的速度增长,但超前的幅度是比较小的,而且在各个时期是不平衡的。今后,在确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 and 目标增长率时,应使教育投资继续以超前的速度持续和稳定地增长,在可能的条件下,力争使教育投资超前增长的幅度适当提高。

2、随国民经济的增长,逐步提高教育投资在国民收入和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一国一定时期教育投资在国民收入中比重的大小,最终是由该国该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民收入尤其人均国民收入较多的发达国家,其教育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高于发展中国家。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要求我国的教育投资比例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不现实的。但也必须看到,在经济与科技国际化发展的当代,由于科学技术在国家之间的横向影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可以利用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绕过发达国家技术和经济发展当年所走过的某些阶段,从而使教育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高于发达国家相同经济水平时所达到的水平。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由于“左”的错误思想指导,教育事业不被重视,安排投资的顺序是“一工交,二财贸,凑凑和和是文教”。教育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是较低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虽然大量增加了教育投资,提高了教育投资在国民收入,尤其是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但教育投资比例仍然是偏低的,教育仍然是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要保证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要保证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必须在经济不断发展,人均国民收入不断增加的条件下,逐步提高教育投资在国民收入和财政支出中的比例。

3、逐步提高各级各类受教育者的人均教育投资,大幅度提高中小学生的教育投资。三十年来,虽然我国受教育者人均教育投资总的说来也是上升的,但是,由于我国教育规模庞大,教育投资较少,受教育者的人均教育投资是相当低的,而且在不同时期和年度波动又比较大,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教育质量的提高。

近年来,虽然党和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大力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的劳动报酬水平。但目前,各级各类学校、主要是中小学办学条件仍然太差,甚至有些地区缺乏起码的办学条件,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素质差、劳动报酬水平太低,这一问题在对内搞活经济的条件下更为突出。如果不大幅度提高受教育者、特别是中小学生的人均教育投资,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质量的提高,四化的实现,将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为此,必须采取非常措施,大力改善办学条件,大大提高教师的劳动报酬水平,大幅度提高各级各类受教育者的人均教育投资。

4、广开教育投资渠道。鼓励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家庭和个人、海外华侨等各种社会力量增加教育投资。对于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教育投资应采取立法措施,切实保障,为确保财政支出中教育投资的来源,可考虑开征教育税。

5、加快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调整教育投资结构,大力提高教育投资的使用效果。加快教育事业的发展,关键是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加快改革的步伐。就教育投资来说,必须按照调整教育结构的要求,合理分配和调整教育投资结构,首先,必须大大增加普通教育投资,提高普教投资比重,保证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同时,努力增加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投资,保证中等教育结构的调整,逐步调整高等教育投资中的层次和专业结构,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各种专门人才的需要。

在大力增加和调整教育投资结构的同时,还必须大力提高教育投资的使用效果。力争以较少的投资,培养较多较好的人才。在这方面,我国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尤其高等教育,在今后的一定时期内,发展高等教育应以“内涵式”为主,尽可能挖掘现有高校潜力,改变那种一谈发展高等教育,就是铺新摊子、建新学校的办法。建立高校的适度规模,提高规模效益,就普教来说,也要讲求投资效果。更为重要的是,要采取立法措施,保证投资不被挤占或挪用。

(参加过本课题研究的还有王泓、荣志刚等同志)

(上接第97页)

“去个性化”会降低个性及责任感,但这也属于势不可免。只有结成群体,个体才能生存和发展,虽然这以对个体的一定损伤为代价;如果因噎废食,一位个体“自由”地活动和发展,则不但群体被瓦解废弃,恐怕就连这绝对“自由”的个体也迅即不复存在。这种两难选择,恐怕只有在绝对的理想状态(而非现实存在)中才不存在。这只是一般性地讨论,如果联系到中国的历史传统,对此必须重视。中国封建社会里,无论家庭或国家,都把群体凝聚及其结果当成目的,为了极端强调并巩固群体而去个性化,甚至不惜压抑、消除以至泯灭个性,导致群体成员缺乏个性,没有主体意识和创造精神。家长制下的家庭成员,无论夫妻、父母、子女无不在生理、心理发展上遭受严重的压抑和遏制。就连家庭至高无上的权威父亲家长也未能免,不仅以牺牲全体或部分家庭成员的幸福换取其高高在上的宝座和家庭的完整,“团结”,为了保持其“尊严”和权威,也不得不抑制自己的情感、个性,或者成为伪君子。结果全体家庭成员都成为去个性化的牺牲品。

尤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历史传统的影响并未消除灭绝,而是深深地积淀在我们的思想、心理、行为活动、思维方式中,内化为一种社会心理,影响着今天的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今天,能否正确理解和处理家庭凝聚力与去个性化、群体意识和个体精神的关系,既关系到每个人的成长发展,又关系到家庭幸福、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家庭凝聚力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或者说,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而最终是从属于服务于人及其全面发展的,其社会意义归根到底在于为家庭成员尤其下一代创造一个全面发展的良好环境,使个体健康成长。家庭凝聚力愈大,说明家庭成员的精神整合愈密切愈完善,受到的约束力也愈小。个体在这种家庭环境中也就成为家庭的有机组成部分,使家庭成员的相互关系越密切亲近。可见,家庭凝聚力与个体成长互为条件和后果,相互依存,相得益彰,为了一个共同目的——家庭成员的共同的全面发展——而殊途同归。但是,我们仍须警惕和防止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特别是用强调家庭凝聚力和妨碍个性发展的偏向。